

# 长野确《松阴快谈》中的中国散文观

刘欢萍

(南京大学文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3)

**摘要:**长野确《松阴快谈》是日本江户时代诗话,其论评诗文颇有独到之见。其中卷二论文章之学,对中国古代散文历史演变、散文本体、创作及鉴赏批评等方面,均有深入而具独创性的见解。发掘其中国文评观,可为当今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提供一些新视角,同时也可考见中国散文及文论对域外文章学的影响、受容情况。

**关键词:**长野确;《松阴快谈》;日本中国文章学;文法论;文气论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3)03-0186-06

中国古代散文成就突出,虽然不及古代诗歌对东亚国家的影响深远,但它对日、韩诸国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日本的中国文章学研究是其汉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尤其是自江户时代(1603-1867)以来,成果颇著,而且大多采用“文话”的形式。复旦大学王水照教授曾辑有《日本中国文章学论著选》,收录有日本文话《拙堂文话》、《渔村文话》等;2007年,王水照教授主编的《历代文话》(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附录有“知见日本文话目录提要”一编,收录30种日本文章学论著提要。虽然此种统计尚待进一步充实,如其中散见于日邦文人别集、笔记等中的文论未予辑录,然而大体可知,日本关于中国文章学研究的文话、文论相对于诗话、诗论著作的极度繁盛来说毕竟稍逊一筹。但有一点历来为研究者所忽视,即在大量存在的域外诗话中往往掺入不少文论,它们从域外角度对中国文章学进行的探讨,常能发人所未发,颇具研究与借鉴价值。

日本江户时代诗话《松阴快谈》即是这样一部有价值的著作,撰者长野确(1783-1837),字孟确,号丰山,伊豫人。修业古文,著有《武乘》、《诗约》、《文约》等。是书撰于文政三年(1820),今有《日本诗话丛书》第四册本,韩人赵钟业《日本诗话丛编》第八册本<sup>①</sup>。书前有长野确《自序》,述成书经由。后有吴江沈懋德跋语,评曰:“其中评论古今及诗文书画之属,援引博洽,时具特识,以儆物、服诸君,雅称后劲。”全书共四卷,其中卷二集中论文,议论虽属条目论列式,但自具一定的原则性与系统性,反映了长野确对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散文本体、创作及鉴赏批评等

的见解。当然不乏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借鉴,但更多的是结合本邦创作而产生的独到体认。发掘其中国文评观,可为当今中国散文研究提供一些新视角,同时也可考见中国散文及文论对域外文章学的影响、受容情况。

## 一、关于中国古代散文的演变及其经典

《松阴快谈》对中国历代散文的批评及散文经典的评价,有着较为精辟的论述。从总体上说,长野确主张论文应不拘世代。他引述明代都元敬《铁网珊瑚》之语:“今人收画多贵古而贱今,且如山水花鸟,宋之数人超越往昔。但取其神妙,勿论其世代可也。”长氏进一步推论说:“余谓,书画诗文,皆不拘世代可。”他批评世儒论诗文以世代为高下,是“耳食”之言,并明确提出自己的观点:“诗文之佳恶,在人而不在世,在诗文而不在人。”由不拘泥于以世论文,长野确进一步延伸出“前人不必胜后人”说。他说:“前人不必胜后人,如《列子》之不及《庄子》,左氏之不及司马,范晔之不及陈寿,《晋书》之不及《五代史》诸皆是也。岂得拘世代哉。”<sup>[1](264)</sup>

厚古薄今向来是中国诗文评论中惯见论调<sup>②</sup>,“一代不如一代”的文运论屡现于论者笔下。可贵的是,长野确没有盲目蹈袭成说,认真地对中国文章之历史演变作出思考,所以能发人所未发。例如长野确曾再三突出的“左氏不及司马”说,就与中国传统见解差异甚巨,他说:“左氏之不及司马,犹《列子》之不及《庄

收稿日期:2012-10-09;修回日期:2012-12-29

作者简介:刘欢萍(1983-),女,安徽池州人,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外文艺理论,比较诗学。

子》也。”并引述朱熹与胡应麟的两段议论，认为“皆所谓眼透纸背者”：“朱子曰，《孟子》《庄子》，文气俱好，《列子》便有迂僻处，《庄子》全写《列子》，又变得奇峻。胡元瑞《笔丛》曰：大抵《列》之文法、《庄》之文奇，列犹丘明，庄犹司马。列规矩，驯而易入；庄崖岸，峻而难攀。”<sup>[1](264)</sup>至于缘何不及，长氏也有详细分析：

余常持左氏不及司马之说，其略曰：人皆知班之不及马，而不知左氏亦不及司马也。子长之文犹文人高士为水墨山水，略有笔墨，而妙处在笔墨之外；左氏犹画匠之著色山水，固守规矩，而不敢胡乱下一笔也。然求其神采秀发，气韵流动，不可多得也。左氏一部自首至尾，唯是一法，少变化。至《史记》，则纵横变幻，使人把捉不得，所谓神明于法者。<sup>[1](263-264)</sup>

可见，长氏以“法”为准权衡二者优劣，一“唯是一法”，一“神明于法”，左氏之文短于固守规矩、拙于变化；司马之文长在变幻纵横、意在言外，因而优劣自异。在中国传统的文评中，论者多以二著各具千秋，称《左传》则以“春秋笔法”，许《史记》则谓包孕丰富。常将司马与班氏作比较，将其与左氏比较实为罕见，且无论长野确的评论是否正确，至少足备一说。

当然，这并非表明长野确忽略了秦汉古文的整体成就，实际上，他在讨论古文时，经常从中推举一些经典著作作为初学者之门径。如《孟》、《庄》、《左》、《国》，长氏就屡作颂扬，称为“古文之美者”。他还特别提到一些不太为人注意的古文著作：“叙事之奇古者，莫如《檀弓》、《穆天子传》焉，汉武、飞燕内外传，亦野史之古者，文家不容不读。”<sup>[1](270)</sup>

然而，相对于秦汉古文，长野确更为欣赏的仍是唐宋古文，尤以八家为最。他认为韩、柳、欧、苏等八家文，“已为千载之宗师”，后世学文者，“不得不依其法”。长氏对八家的称颂不吝赞词，认为他们的部分篇章完全可与司马之文相匹肩，而毫无逊色。他例举柳子厚《段太尉逸事》，谓“咄咄如生，与马迁相上下”，又说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与马迁相上下，范晔、陈寿皆不能及也”。

八家之中，长氏极崇韩、柳、欧、苏四公，他以“法度”为线索认真准确地分析了他们各自古文的特点：

光明正大，法度森严，而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如韩文公焉；纵心姿腕，篇法政严，序次详备，丽句层出，愈多而愈不乱，莫如柳柳州焉；婉曲周折，法度闲暇，词意醇厚，气调员美，莫如欧阳公焉；纵横排奰，才锋俊伟，奇奇怪怪，不与法期而与之合，

莫如苏文忠焉。<sup>[1](258)</sup>

韩愈之文以法度谨严又浑浩流转为特征，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说：“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鼃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掩蔽，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sup>[2](122)</sup>柳宗元之文则篇法严谨，又不露痕迹，名章警句，迭出不穷。欧阳修之文，纡余委曲，说尽事理，苏洵赞云：“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sup>[2](122)</sup>东坡为文，则“工于命意，必超然独立于众人之上”<sup>[3](333)</sup>。长野确的评析可以说十分准确地把握“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的特点<sup>[4](1165)</sup>。

长野确虽然主张论文应不拘世代，但在具体论文实践中，却难免自相矛盾。典型如对宋以后散文的评价，长野确认为古文之佳者大体在宋前，元明清即便有名家一二，整体却每况愈下。他论列元好问、赵孟頫、杨维桢等元代“有文名者”十余家后，谓其只可比之于“宋之小家数”。紧接着他说：“至明文运又旺，名家不啻千百，然亦皆不能仿佛宋人，独王阳明可与宋大家比肩而立矣。”<sup>[1](277-278)</sup>可见，长氏认为元文为宋与明之间的一个低谷，但是明文虽较元文为长，却不足与宋文并辔：

明人务求胜宋人，然其学术文章，曾不能仿佛宋人，大抵宋人能自为一家，不肯蹈袭前人。明人好剽窃古人，是其胆识已迥然不同也。清人长于考据，指摘前人之谬误，旁引博证，往往中其肯綮，然短于著作，其不及明人，犹明之于宋也。<sup>[1](290-291)</sup>

明文不及宋，而清文不及明，更遑论宋文。长氏此说并非一家之见，认为文章随气运代降恰恰是中国古人常弹之调。这与其“前人不必胜后人”的进步主张是相龃龉矛盾的。

长野确认为明人古文之所以落下一乘最主要的原因是“剽窃”：“明人所谓古文皆第剽窃古语耳，至其法度神妙，则未尝梦见。”他举出明中期前后七子之领军人物为例：

何、李、李、王之诗文，譬犹剧场中正未净丑戏子之语言，模拟文饰太过，强笑强哭，毫无神气，故乍读之可喜，再读之使人羞赧。

明李于麟、王元美剽窃古语，以为古文，不知文之古今在结构，而不在字句之末也。结构合古法，虽用俗语，不害为古。<sup>[1](283)</sup>

前七子李梦阳、何景明等倡“文必秦汉”，目的虽在矫台阁茶陵之弊，但他们盲目崇古，作文时又难脱以摹拟代创造的窠臼。此后的后七子李攀龙、王世贞

等,把复古风推向更高潮,创作上比前七子更死板地模仿古人。

长野确虽深挾明文剽拟之弊,并以何、李、李、王为矢的激烈排击,但他并非完全否定明文。他说:“明文之佳者,莫如王阳明焉。遣言措意,纵横开阖,靡不如意;方正学、徐文长,亦恢恢乎疾驰矣;简洁雅驯,莫如刘青田;富赡雄伟,莫如宋景濂。……”<sup>[1](278)</sup>列举明文之善者数人,而其中对王守仁之文更击节不止,屡作称赏。谓:“从前论明文者,未尝及王阳明。余读《阳明文录》,纵横俊伟,出入高下,靡不如意。”<sup>[1](278)</sup>他甚至认为王阳明是衰弊的明文中唯一堪“与宋大家比肩而立”者。的确,王阳明的散文,雅健沉雄,能独抒胸臆。他的思想与文章,对唐宋派和公安派有直接影响,在清初评价很高,但桐城兴起后,则多受冷落。长氏以其文为明文之“佳”者,可谓巨眼。

相较明文之弊在“剽”,清文则病于“细”。“清人之文,能入细而不能为大。秦汉古文,大抵粗枝大叶之文,气骨雄壮,豪荡不羁,所以为高也。清人之文,唯于枝叶上粉泽,是所以不及也。”<sup>[1](285-286)</sup>

## 二、关于中国散文的本体与创作

《松阴快谈》中长野确最着力之处,是对散文本体、创作方法及入门途径等的探讨。其中很多精见可以与中国古代文论相为参观,也对现今的散文创作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首先,强调“文有四法”、“法与我一”。长野确认为散文创作必须明知文法,“作文如用兵”,学文者须“先学字法、句法、章法、篇法”,犹如学诗者“先学平仄,排比句法、韵脚也”。他称引本邦太宰德夫《文论》曰:“文有四法,曰篇法,曰章法,曰句法,曰字法。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四者皆有法,一失其法,则不成文矣。”<sup>[1](252)</sup>又说:

文欲雅健而婉曲,此用工夫在字法与句法。又欲气脉流贯,而变化曲折,不支离旁斥,此用工夫在章法与篇法。作句大抵欲曲而不欲直,欲省而不欲增。曲则有味,省则不弱。作篇欲前面伏后面,前段生后段,枝叶相生,则自然活泼不死矣。<sup>[1](291)</sup>

拈出四法,以为作文之规矩,这不仅令初学者有径可循,也道出古文关键所在。

长氏谆谆突出四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针对日本当时文坛现状而发。他曾屡次批判本邦文人创作、论者论文,均未尝知法。他说:“邦人论文者,大抵知字

法与句法而已,未尝知有篇法也。论文及篇法者,独太宰德夫而已。然择而不精,语而不详。”<sup>[1](270)</sup>又说:“本邦儒者作文,多未知篇法而妄作也。”即便是以荻生徂徕为首的古文辞派也存在着相同的缺陷,“所作犹多失篇法,如德夫之言,况他人乎?”<sup>[1](252-253)</sup>长氏最后指出忽略字法、句法,尚是小疵,至失篇法,则“安在其为文哉”?由此可见,四法当中,长野确以篇法为最关键。

长野确还以唐宋大家为例,具体阐明“法”的重要性。韩昌黎“法度森严”,柳子厚“篇法政严”,欧阳永叔“法度闲暇”,苏子瞻“不与法期而与之合”。又说:“韩学孟,欧学韩,终不见其蹊径,张无垢所谓櫛柄入手,开导之际,改头换面,随宜说法,使殊途同归。是可以悟作文之法。夫孟、韩、欧、苏之所同者,在其法度结构尔,不可求同于字句之末矣。”<sup>[1](259)</sup>明了法的重要性之后,关键在如何得法,长野确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即求之经典:孟、庄、左、史、韩、柳、欧、苏。“欲知议论文法,且试读《孟子》、《庄子》;欲知叙事之法,且试读《左传》、《史记》。反覆以索其结构之法,久之自了然矣。不必须多辩也。”<sup>[1](260)</sup>

尤为可贵的是,长野确虽强调“法”之重要,却不为所缚,指出应当“法与我一”,堪称卓识。他认为若要“变化纵横,出奇无穷”,则出于“天资妙才,非工夫所能及也”。“文法甚严且明”但“本无定法”。的确,为文虽须心中有法,但决不可为法所限,否则行文拘谨,“笔端窘束,气脉不贯”。但如果完全无视法度,又“愤焉自放”,易“叙次错置,前后支离”,故必使“法与我一,不与之期而合”,浑化无迹,才堪称“善文”。

其次,强调“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为奴”。法的强调是为文的方法论层面,它并非终极目标,立意才是根本。“文以达意为主”,长野确认为意、气、辞是文的三要素:

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为奴,是千古不易之定论也。造语虽巧,而气脉不贯,主意不明,是奴婢强而主辅弱也。故能役使奴婢,而不能为奴婢役使,斯可谓善文矣。喋喋千言,意晦气弱,将焉用文,不如不作之愈也。<sup>[1](254)</sup>

以主奴关系类比“意”“气”“辞”三者关系,贴切准确。事实上,“文以意为主”是古代辞章家们反复阐明的论题。晚唐时杜牧就有过类似的表达,他在《答庄充书》中说:“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sup>[5](182)</sup>其实三者之中,长野确对“气”的强调也是十分着力,他认为气脉通贯,则言无不宜,而文之强弱也根柢于此。为此他引述了魏曹丕“文气”

论与唐韩愈“气盛言宜”说，并被誉为“千古之确论”、“作文之要诀”。

对于“气”、“辞”二者关系，长野确给予了更多关注。“文之强弱，在气而不在辞，世有以艰涩为强，以平易为弱者。东坡之文，平易著明，于麟之文，艰涩隐晦，然孰强孰弱，孰优孰劣，孰奇孰拙，具眼者必能辨之。”<sup>[1](255)</sup>然而，语辞与气脉还须与法度相结合，才称完美。“造语雅驯，一气流贯，纵横驰骋，不失法度，乃称作手。”设若只是造语精巧，但“气脉不贯”，则如“剪彩之花，终无生气矣”；另一方面，如果“纵横驰骋，无规矩法度”，也只是“风颠汉之絮语，岂成言语哉”<sup>[1](270)</sup>。可见，三者间相辅相成，方能铸就宏文。

具体到创作中，长野确主张“一气呵成”，融化诸法而无断续之痕，反对铢积寸累、惨淡经营。他说：

“作文须一笔写去，首尾粲然而后稍加添删，则自然有活泼流动之气，若铢积寸累，则死气满纸，使读者厌倦思睡也。”<sup>[1](256)</sup>他还将之比喻为人的躯体，四肢百骸作用各异，有流贯全身的“气”从中斡旋，才能生活运动。文章也是如此，虽然有抑扬、开阖、操纵、起伏、回抱、接初等种种方法，但唯有以“气”贯之才能生动。可见，长野确虽然强调文法，然而他所说的法是不与“气”相违背的“法”，法虽然于文至关重要，却不能为法而法。作文最关键在于气脉充盈，一气流转。

当然，强调“意”主“气”辅“辞”奴，并不表示长野确忽略语辞在文章中的作用。长氏对话辞的讨论着墨亦多，并体现出初步的辨体意识。一方面，他认为“文体已异，语气自别”，语辞随体裁的不同而各异。“有经语，有史语，有小说家之语，有语录随笔之语，论记序书尺牍之类，文体已异，语气自别，断断不可混用也。”<sup>[1](255)</sup>又说：“有套语，有歇后之语，用之诗、尺牍小文辞，犹可也。至作文议论大文章，则必不可用也。”<sup>[1](255-256)</sup>另一方面，长氏由此生发，强调“辨体”之为急务。他批评陋儒不能辨文体，粗心读书，见中国人或用俗语、或用套语、或用歇后语，不辨古今，不问文体，以为文章都是如此，也肆意模仿，随处乱用。他主张“文体之不同，犹画工之于草木禽兽，各别体也”。所以学习作文的人，辨体是首要之急务。

再次，强调创作须“学”、“悟”结合。其一，涵咏经典、师友切磋相结合。“法”为文之干，欲立此干，学习为文，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无非是从前贤经典、时彦师友两方面汲取养分。长氏说：“诗法易认，文法难知。欲知作文之法，则莫如熟读韩、柳、欧、苏之文，

而又不可无良师友也。否则用力甚劳，而误认不少。”<sup>[1](253)</sup>如前所论，长氏论文极为推举韩、柳、欧、苏等四家之文，视为第一乘，至以为学文必须熟读之，辅以师友切磋，方更为确当。

对于取法的经典，长氏遍列先秦以来诸多名作，只是在学习时，长氏强调宜精不宜杂，“惟要精看数部，须使书味盈胸中，慎不当贪多矣。”“读历史诸子钞本，不如读一部史子也。读诸家选本，不如读一家全集也。”<sup>[1](251)</sup>长氏列出应精读的经典之作：《左》《国》《史》《汉》，《孟》《荀》《庄》《骚》，加以韩、柳、欧、苏三全集。反覆精读，然后下笔。专则苦贫，博又易杂，所以学文者亟需慎重，长氏谆谆教以全集替选本，对目今的创作实践来说，仍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因为选本于鉴赏有较大价值，然而对于指导创作学习、深入了解作家体格时，选集不免捉襟、窥豹之嫌。不仅如此，长氏还接着说：“然不可无良师友琢磨也。否则不免独学固陋矣。”再次突出“良师友”的琢磨之功，必不可少，可使为文者事半功倍。

其二，“学”、“悟”结合。长氏称引陈师道《后山谈丛》“法在人故必学，巧在己故必悟”之语，谓：“两个工夫不可阙一也。盖无师友琢磨，则规矩准绳不可得而知也，故必学焉；夫运用之妙，存于一心，在我自得，不可恃他人也，故必悟焉。”<sup>[1](258)</sup>

### 三、关于中国散文的鉴赏与批评

长野确不仅对中国散文发展史与散文本体论、创作论有深入的论述，同时也对散文鉴赏、批评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其一，从批评者主观看，长野确主张须平心静气，反复求索。他说：“凡观人诗文者，虚心平气，反覆数过。”力求体察作者用心。在此基础上，还须推人及己，思考如果自己创作，“果能胜之否？果能及之否？抑不可及否？”然后才能评论作品佳否，“庶几不谬”。那些“率以爱憎之口，妄加讥评于人文”者，长野确讥之为“矮人观场，从人啼笑”，道出了古来率评者不加深究、人云亦云的共病。

其二，就具体批评而言，长野确认为应当以篇章结构为重，观大忽小。“先须察其结构大势如何，此果佳，有小瑕累，未足为病也。”他还引述了柳宗元的议论：“古今号文章为难，非谓比兴之不足，恢拓之不远……得之为难，知之愈难耳！”<sup>[1](266)</sup>以为子厚此论“善哉”。同时批评当时的文人以“井蛙之见”，妄意品评文章，“偶见小疵，哗言攻之，并其全体之美，弃

掷不顾”。

当然,强调“结构大势”,正是长野确论文讲求篇法、章法的自然述求。但这并非表示长野确忽视鉴赏批评中文辞这一衡量因素。他认为文辞惟“求其美”为是,反对以措辞的难易、表达的繁简为衡文之标准:

论文不问其美恶,惟简短而后可,则濡墨吮笔,可一朝驾欧、苏之上;惟繁长而后可,则缀字满纸,皆可压倒孟、韩,视字之多少,以为文之高下,则三岁童子皆可以论定古今文章矣。杨升庵曰:“繁非也,简非也,不繁不简亦非也;难非也,易非也,不难不易亦非也。繁有美恶,简有美恶,难有美恶,易有美恶,惟求其美而已。”<sup>[1](267-268)</sup>

此处所引杨慎(1488-1559)论文语出自《升庵集》,杨氏认为“论文者当辨其美恶,而不当以繁简、难易也”<sup>[6](1654)</sup>。在中国的散文鉴赏批评中,繁、简问题实际上一直是众多论文者的重要话题之一。元代王构(1245-1310)撰《修辞鉴衡》卷二“繁简”条云:“文有以繁为贵者,若《檀弓》石祁子‘沐浴佩玉’,《庄子》之‘大块噫气’用‘者’字……文有以简为贵者,若《舜典》‘至于南岳,如岱礼’,‘西岳如初’……但繁而不厌其多,简而不遗其意,乃为善也。”<sup>[7](1213-1214)</sup>清代顾炎武在《日知录》论文时说:“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也。繁简之论兴而文亡矣。《史记》之繁处,必胜于《汉书》之简处;《新唐书》之简也,不简于事而简于文,其所以病也。”<sup>[8](3237)</sup>二人都主张论文不应以繁简、难易为准,而以美恶为度。

#### 四、结语:长野确对中日古典文论的接受与创新

毋庸置疑,《快谈》所取得的成就与中、日古典文论、诗话等的影响分不开。它受中国文论的影响深远,如前文所论,长氏经常援引中国文人、学者的文论观,例如曹丕、韩愈、陈师道、朱熹、吴莱、胡应麟、焦竑、杨慎等人的观点。长氏还经常表达对中国学者的推崇之情,例如南宋理学家吕祖谦,“余在昌平学舍,阅写本吕东莱先生《左氏博议》,……读《博议》亦知东莱学殖之富,才力之雄。”<sup>[1](279)</sup>南宋思想家陈亮,“(《龙川文集》)读之,议论恢奇,如其为人。……其学虽诡,要亦一世豪杰也。”<sup>[1](280)</sup>明朝学者胡应麟,“余读胡氏《笔丛》四十卷,其学赅博,明儒盖少其比矣。”<sup>[1](238)</sup>明朝学者杨慎著作、王世贞《艺苑卮言》,长氏亦屡屡称引,以为是“可谓具论矣”、“甚佳”。

除了中国文论之外,日本古典文论也对长氏文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论述文有四法时,长野确屡

次称引太宰纯的文论,谓“善哉,太宰氏之言,本邦先辈论文,能及此者盖有之矣,我未之闻也”。<sup>[1](252)</sup>此外,长野确还在《快谈》中多次表达了对本邦先儒的尊崇之情。

然而,在承袭先贤文评成果的同时,长氏也有自己的创新之处。其文论所体现出的独到特点、创新价值值得我们认真探讨。

其一,偏重古文,不喜骈文,是它的一个特点。诗话对先秦古文,以至唐代韩柳均有较高评价,但提到柳文中夹杂骈俪之语时,却讥之为“驳杂”,颇为不屑。又如,长野确指出陆贽奏议之作,文辞典质温雅,但不免“骈俪之体”。言语之间,亦是对骈俪之语有所微议。

其二,常以指导本邦创作为出发点论析中国散文,是《快谈》的另一特点。其中不少观点对当时的文坛具有指导性意义。例如作者鉴于当时日本文坛重字句之法、忽篇章之法的现象,屡作感喟,并锐意革弊。又如,针对本邦以荻生徂徕为首的古文辞派,长氏基于室鸠巢等人的反古文辞说,常予贬斥。例如援引苏洵之言论,借以批评古文辞派,“苏老泉曰:‘今夫绣绘锦黻,衣服之穷美者也。尺寸而割之,错而纫之以为服,则绋纆之不若。’李、王、物、服,所谓古文辞者,无乃类此乎。”<sup>[1](285)</sup>物、服指的是古文辞派的荻生徂徕及其弟子服部南郭。长氏对古文辞派的批评主要仍是集中于对荻生徂徕的批判。例如引用伊藤东涯之论徂徕文章之语曰“譬犹著鬼脸恐吓婴儿”。又在论述本邦文章学发展历程时说:“享保年间,物徂徕出,才气超卓,始悟西土之文理,自以为独得之秘,于是蔑视先儒,傲睨海内,造为新说名曰‘古学’。高言虚喝,以风靡一世。当时诸儒不心服者,欲与之抗辩而才力不足,徒愤惋而已,可胜叹哉。”<sup>[1](286)</sup>长氏认为徂徕之失在过于迷信李攀龙、王世贞,“徂徕之才,豪荡不羁。……但恨过信李、王,误用其才”。<sup>[1](287)</sup>

其三,论文时将中、日作家进行比较,时有新见,能发人所未发。如将江户时代优秀的诗人新井白石、熊泽蕃山,比之唐、宋名家,认为二人与之“比肩而无愧色焉”。<sup>[1](231)</sup>“新井白石,经世之才,可比贾太傅、陆宣公,如诗文,特其余事耳。”<sup>[1](288-289)</sup>又如将崇信前七子的荻生徂徕与李攀龙、王世贞进行比较,“茂卿笃信李、王,终身不疑。然其才实出李、王之上,茂卿之文,气骨矫矫,笔力俊利,李、王迂僻不快乐。”<sup>[1](287)</sup>长氏认为徂徕之才、文皆为李、王所不及,毋论此评确当与否,然亦足备一说。

综上所述,《快谈》受到中、日古典文论的广泛影响,它的文评观有承有革,不乏独到创新之处。其不

拘世代说、前人不必胜后人说，对今日之古文研究仍颇具启发性。其中一些小的观点，也体察入微，新见迭出。庐山面目，身在其中者往往无法探骊得珠，域外之眼、他山之石，常常易获攻玉之功。要之，研究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散文的著作，既对我们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有他山之石之效，也为中日文章交流史提供生动的材料，理应受到我们的关注。

#### 注释：

- ① 本文采用蔡镇楚《域外诗话珍本丛刊》（第5册）影印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
- ② 关于文章与世高下的议论比比皆是，例如明何良俊撰《四友斋丛说·论文》：“世变江河，盖不但文章以时而降，至于人品语言，以今较古，奚啻天壤！”（《历代文话》第2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48页。）诸如此类议论在中国古典诗文评中屡见不鲜。
- ③ 关于藤原惺窝、林罗山、林凤冈、木下顺庵等人的评论，参考了[日]松下忠著《江户时代的诗风诗论》，学苑出版社，2008年版。

#### 参考文献：

- [1] [日]长野确. 松阴快谈[M]. 蔡镇楚. 域外诗话珍本丛刊(第5册).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6.
- [2] 苏洵. 上欧阳内翰第一书//郭绍虞. 中国历代文论选(第2册)[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 [3] 范温. 潜溪诗眼[M]. 宋诗话辑佚(上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4] 李渔. 文章精义[M]. 历代文话(第2册).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 [5] 杜牧. 答庄充书//郭绍虞. 中国历代文论选(第2册)[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 [6] 杨慎. 升庵集·论文[M]. 历代文话(第2册).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 [7] 王构. 修辞鉴衡[M]. 历代文话(第2册).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 [8] 顾炎武. 日知录·论文[M]. 历代文话(第4册).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 On Nagano's Note *Shongyin Kuaitan* about Chinese Classical Prose Criticism

LIU Huanping

(Chinese Department of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Nagano's *Shong-yin Kuai-tan* was a notes on classical poetry in Japan's Edo period, which contained both theory and criticism about poetry and prose. And most of the notes were creative. The second volume commented on the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prose. On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ntology, creation, appreciation and criticism of prose, this work had unique and profound insights. We study its idea of Chinese classical prose which will provide new view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ancient prose. In the meantime, we can als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the Chinese prose, literary theory to Japanese prose and literary theory in Edo period.

**Key Words:** Nagano; Shongyin Kuaitan; Japan's Chinese articology; grammar comment; style of writing

[编辑：胡兴华]